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史海钩沉】	江青为何怨恨公安机关？	尹曙生
【文革一幕】	“文革”中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	王春南
【荒唐年代】	江青改戏闹革命	陈徒手
【人物春秋】	“文革”中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	钱 江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史海钩沉】

江青为何怨恨公安机关？

• 尹曙生 •

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江青先后在15个场合声嘶力竭地提出砸烂公检法，点了20多位公安机关领导的姓名，这些被点名的人先后被抓进监狱。所以我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发表的《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一文中说：“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有些读者给我来信，提出疑问：文化大革命前，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到全国各地去，你们公安机关都要为她服务、为她警卫，她和你们公安干警联系最密切，也最信任你们，有什么恩怨可言？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要砸烂公安机关，没有详细说明江青对公安机关、公安干部怨恨的由来，读者有疑问，可以理解。本文就江青对公安机关、公安干部怨恨的事实和由来加以阐述，以便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江青其人，这对了解共和国那一段历史会有帮助。

1977年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共有680多人参加。我作为安徽省公安代表团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安机关，否定公安工作，残酷迫害公安干警的罪行，澄清公安工作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指派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具体领导这次会议。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40多名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的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坐牢时间最长的达10年之久，最短的也有四五年，对江青恨之入骨。1978年1月3日晚上，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辽宁在文革中坐过牢的25位老公安，串联开个座谈会，交流各自坐牢的经历和经验教训，发起者是江苏省公安厅老厅长洪需霖（“两案”审判时，他是江青一案的公安预审员，江青经常和他顶牛，拒不认罪，以致一度预审不下去——笔者）。安徽省公安厅厅长马敬铮在文革中被江青点名以苏修特务嫌疑被捕入狱

9年，出狱后身患肝癌住院治疗，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不久去世。安徽省公安代表团由常务副厅长伍彤率领出席，他获邀参加座谈会。伍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点名，诬陷为苏修、蒙修双料特务，坐牢8年，出狱后身患糖尿病、高血压、青光眼，由于行动不便，要求我陪同他去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愉快接受。

座谈会开了3个小时，与会者发言踊跃，个个怀着满腔怒火。有人在发言中数度哽咽，泣不成声，其中一人因为心情激动，血压升高，晕了过去，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大家控诉的主题是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坐牢经历，但是在讲到被迫害的具体问题时，我发现讲的大都是江青如何如何迫害他们，很少提到林彪迫害他们的具体事实，甚至连林彪砸烂公安机关的话好像也没有说过。不过，林彪老婆叶群配合江青迫害过公安和文艺界人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一些场合说过附和江青要砸烂公安机关的一些话语，具体砸烂行为也都是奉江青指示而为。在控诉批判中不时有人自问：公安机关和我们没有得罪过江青，她为什么那么痛恨公安机关、痛恨我们？有一位局长说，我接触过江青15次，每次都尽心尽力为她服务，指派专人照顾她的生活，警卫她的安全，为她找最好的医生看病。我自己还经常陪她游览、陪她购物、为她挑选舞伴陪她跳舞，她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不满，甚至还多次表扬我，说我办事认真、细心。可是文革开始不久，她就点我的名，说我对毛主席和她搞窃听，扣押毛主席和她的信件，整理她的黑材料，结果我被押到北京关了7年半。有一位厅长说：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们无限崇拜毛主席，虽然感觉她爱挑剔，难侍候。但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对她始终尊敬有加，她交办的事，我们想方设法去办，她对我很满意，1959年、1964年两次主动和我合影留念，我很感动。可文革中她点了我的名，说我整她的黑材料，把我关进监狱，通过叶群指挥空军部队战士冒充造反派两次对我家进行搜查、抄家，合影照片也被搜走了，同时被抄家的还有和江青熟悉的演艺界的名人。有一位局长说，江青30年代的历史我比较了解，当时她在上海当演员，她和几个男人同居过，绯闻较多。尤其是1936年和唐纳结婚后，不久就闹翻了，又和别人同居，导致唐纳在济南、上海两次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一时成为上海滩最大绯闻。因为演艺界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我们也不感到特别奇怪，而且考虑到她年轻时追求进步，不到20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被逮捕过，经过营救出狱，后来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和毛主席结婚后，两性关系乱的老毛病没有再犯，所以实话说，对她我还是很崇拜的，就像崇拜宋庆龄一样，把她当国母看待。1967年她说我整她的黑材料，把我关了10年，在狱中我常想，毛主席怎么娶了个这么不讲理的老婆……

座谈会结束后，我经过认真思考，怎么也弄不明白江青和公安机关、公安干部有什么过节，她为什么那样痛恨公安机关、痛恨公安干部。当时潘汉年、扬帆冤案还没有平反，这个谜还揭不开。

1987年秋我参加了公安部公安史编纂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情报史搜集整理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胡立教、李世英、李丰平、扬帆等公安老前辈参加指导。我第一次见到了闻名于世的潘汉年、扬帆大冤案的当事人扬帆。几十年牢狱之灾，使他显得特别衰老、疲惫，目光呆滞，佝偻着腰，行走需夫人搀扶，思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天下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请教问题，他说了几句正常的话后，突然对我说：我不能再和你说话了，毛主席派人来接我，专机已经到了虹桥机场，我必须马上走……。听了这话，我感到非常难过。过后有人告诉我，1954年12月31日，他被公安部派来的人员押解北京，说是开会，实是关押，一去不返20多年。关押期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经常自言自语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他去开会。出狱后虽经长时间治疗，仍未恢复，时好时坏。当年他可是公安情报战线的一员儒将，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文韬武略，今天竟成了这个样子！

随着潘、扬冤案的平反，大量信息的披露，使我明白了江青对公安机关、公安干部的怨恨是由来已久的，文革只是个集中爆发点而已。

江青对公安机关、公安人员的怨恨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秋天。当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皖南新四军总部，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项英觉得不妥，向当时的新四军总部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科长殷扬（即扬帆）打听江青在上海的情况。殷扬将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了解到的有关江青的情况写下来交给项英。项英发电报给中央说“此人不宣与主席结婚”，并附上殷扬所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内容主要是综合上海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她的桃色新闻和她曾经被捕过的情况，认为共产党领袖和这种人结婚不妥。可是电报到达之时，毛泽东已经和江青结了婚，电报的内容却由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告诉了江青。江青得知这一情况后的愤怒情绪可想而知。在愤怒的同时，江青也深深地感受到在上海当电影明星那一段风流史，差一点毁了她和毛泽东的婚姻，今后还必将影响她的前程。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销毁那一段历史的记载，可这是办不到的；销毁不了就隐瞒那一段历史，这也难以做到；隐瞒不了就使那些了解她那一段历史的人闭嘴或死亡，可当时她没有那个能耐。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叛徒杀害，去掉了一个知情人。可那个叫殷扬的人在哪里呢？因为是化名，不知是谁。江青时刻记着必须找到那个叫殷扬的人。

不是冤家不聚头。1953年春天，江青因病到苏联治疗，以后和蔡畅在苏联休养胜地巴哈维尔苏联部长会议疗养院疗养，而此时的扬帆（殷扬）因患脑瘤，于2月份经公安部批准、联系到苏联开刀治疗后，也到这家疗养院疗养。4月的一天，在蔡畅的提议和带领下，一同去看望江青。在交谈中江青得知眼前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原来就是新四军时期给项英提供她历史资料的殷扬，她的愤怒情绪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她不动声色，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所以扬帆并未察觉到异常。但是，20天后针对扬帆的突发情况出现了：脑瘤病还未痊愈，却接到公安部电报：立即回国。扬帆于5月11日从苏联回到上海。回来后，没有人给他解释要他立即回国的原因，却接到公安部一纸公文通知他在家“安心休养”。紧接着公安部秘密派两名局级干部到上海调查扬帆问题。1953年12月21日，扬帆的公安局副局长（扬帆职务变动后面有交代——笔者）和市委政法委员职务被莫名解除，没有给他分配新的工作任务，把他晾在那里。1954年12月31日被公安部秘密逮捕，押往北京。第二天，即1955年1月1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审问扬帆，先是询问上海市公安局“以特反特”情况。其实，两位部长非常了解“以特反特”的情况，而且在公安部的指导下已经纠正了，询问只是个幌子，然后转弯抹角地和不动声色地问起他1938年写蓝苹（江青当演员时的名字）材料交给项英的情况。扬帆如实回答。审问结束时，罗、徐两位部长严厉警告扬帆：对蓝苹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今后不准同任何人谈起，即使是审讯你的人也不准谈。文革中专案组几十次审讯扬帆，他都没有说这件事。这就清楚地表明，罗、徐两位部长是来亲自核实扬帆是不是给项英提供蓝苹在上海历史资料的人。1962年，中共元老林伯渠夫人朱明因1953年匿名给江青写信的事被暴露，不得已在家中自杀身亡。在朱明的档案中，周恩来亲笔批示：“毛主席指示：朱明问题同1939年扬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同志的性质是一样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这就说明，扬帆写的江青30年代的历史资料，不仅江青怒火万丈，毛泽东也认为是对着他的。扬帆在劫难逃。

真实的历史要有真实的细节。有人认为，扬帆冤案和当时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政治大背景有关，和他在上海执行“以特反特”的错误有关，跟江青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关系。以上事实已经充分地驳斥了这一论点。下面这些历史细节更加证明江青是扬帆冤案的主谋，而这些细节这么多年来却被很多研究潘、扬事件的人忽视了。

一是“以特反特”是194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饶漱石提出，在中共上海市委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包括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长陈毅，第三书记谭震林，上海市公安局一把手、局长李士英，华东局公安部部长（社会部部长）梁国斌，等，也都参加了会议，表示同意。为什么揪住执行市委决议的公安局二把手、副局长扬帆不放呢？

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是李士英，任期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这是“以特反特”最集中时期；扬帆任局长是1950年6月至1951年12月，后调任华东局公安部副部长，1952年4月又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二是“以特反特”执行时间主要在李士英任局长期间，在扬帆接任局长的两个月后的1950年8月份就开始纠正。1951年2月，罗瑞卿部长视察上海，对上海市公安局“以特反特”提出4点批评：预审科不应该使用特情；不应该用特情领导特情；不应该公开使用特情；用特情不应该太滥（过多）。同时肯定了上海使用特情取得的成绩：一是破了案，有些还是大案；二是发现特情有问题，就立即纠正了；三是对胡均鹤（中共原高级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投敌叛变，先后成为国民党政权、汪伪政权重要特务，抗战胜利后被判刑。国民党垮台前夕被释放出来，投奔新四军，上海解放后被逆用。1955年被捕，1982年平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笔者）用得好，罗部长给予高度评价，说上海侦查工作有锐气，纠正错误的态度也是好的。根据罗瑞卿的指示，扬帆于1951年4月27日将历史问题比较严重的特情分子全部逮捕（不包括胡均鹤），不再使用。所以“以特反特”问题在1951年4月就已经彻底解决，并受到罗瑞卿充分肯定。1951年12月，扬帆被免去公安局局长职务，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局长由原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梁国斌担任，1952年4月，经梁国斌一再要求，上海市委和公安部同意扬帆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直到这时上海市委和公安部还是信任他的。可是自从在苏联同江青见面后，马上被电令回国；回国后不向他做任何解释，不给他分配工作，1953年底免去他一切行政职务。这些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扬帆的失势确实是江青捣的鬼。

三是下面这一历史事实更进一步说明江青是扬帆冤案的主谋：1953年12月27日，江青随毛泽东到杭州，一次在和公安厅厅长王芳谈话中问道：“你认识扬帆吗？”王芳做了肯定回答。江青又问：“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扬，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这时扬帆已经被免去一切职务，江青这样问王芳暗示着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嘛！因为要打倒扬帆，只有他写的江青历史资料发到延安和“以特反特”是不够的，必须抓住他的历史问题。以后，扬帆以“内奸”被逮捕、审讯，就是根据江青说的他曾经在南京剧专工作过，被诬陷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道藩有联系。而此时扬帆还没有被捕，江青就向王芳透露这一秘密，再一次证明江青就是迫害扬帆的主谋（见《王芳回忆录》）。扬帆被捕后，1955年、1956年江青多次到公安部向徐子荣询问对扬帆的审讯情况（见《徐子荣传》）。这都充分证明，江青是扬帆冤案的主要制造者。这是江青和公安机关、公安干部第一次结下的深仇大恨。

江青和公安机关、公安干部第二次结下冤仇，是她先后收到的3封匿名信，使她感到自己的历史问题将会妨碍她第一夫人的地位。而她认为公安机关在侦破这3封匿名信案件上不作为，甚至怀疑是匿名信案件幕后指使者、庇护者；而她的历史问题却被更多专案人员所了解，她担心一旦形势有变，这些了解她历史问题的人就会扩散出去，时刻威胁她的政治生命。因此，文革前她对参与侦破案件的人表面上客客气气，使他们对她有好感，让他们为她保密；文革爆发后，她达到了权力顶峰，原形毕露，有恃无恐，把那些了解她历史的人关进监狱，甚至使他们消失、死亡。那些参与侦破这3封匿名信案件的公安部和上海、浙江省公安厅（局）领导和大部分专案人员，都没有好下场，全部被捕，有的死在监狱里，罪名是对毛泽东和她搞窃听，整理她的黑材料，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对这些人员家里反复搜查、抄家，把涉及她的历史问题的资料、档案、照片统统运到北京，在她亲自监视下销毁。

这3封匿名信是这样的：

1953年12月27日，江青随毛泽东到杭州，1954年3月14日离开，住了70多天（毛泽东先她离开杭州）。3月7日，江青收到从上海给她寄的一封匿名信，披露她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问题和绯闻。江青对省委书记谭启龙和公安厅厅长王芳说，有人给她写匿名信，

诬陷她，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并主动对谭启龙和王芳说明自己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是清白的。回到北京后，江青将收到匿名信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得到认同，于是号称“18号案件”的专案侦破拉开了序幕。这个案件惊动了党政最高领导毛泽东，周恩来。警界最高领导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挂帅负责侦破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召开会议，由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布置，抓案件侦破，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主要领导全力以赴，投入侦破。由于匿名信封上写的是“华东文委”的字样，信又是从上海发的，江青要求侦查部门将重点放在上海市党、政部门和30年代曾经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身上。案件一时未能侦破。

1954年柯庆施调到上海任市委书记后，亲自挂帅负责案件侦破，抓得很紧，专案组100多人，每隔几天就开一次碰头会。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嫌疑人的笔迹，凡是过去和江青关系不好或议论过她、说过对她不满话的人，都作为嫌疑对象，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住的房东家的女佣秦桂贞也都作为嫌疑对象。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夫人曾菲被专案组作为重点嫌疑对象，原因是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党组织对毛泽东前妻贺子珍（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并没有和贺子珍离婚，贺子珍此时住在上海）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赖妻曾菲和贺子珍关系密切，同情贺子珍的不幸遭遇，她又在上海文委工作，所以柯庆施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秘密提取曾菲笔迹，经过鉴定笔迹相似，嫌疑更大了。但是专案组经过严谨细致的大量秘密调查，没有掌握到可靠的直接证据，仅凭相似笔迹，还不能定案，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江青多次过问案件侦破进展情况，怀疑专案组里有人捣鬼，几次对罗瑞卿、徐子荣表示不满。案子一时破不了，但专案组对此案一直没有放弃侦破。公安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犯罪嫌疑人“自投罗网”才告破。原来中共元老、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于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其夫人朱明（原名王钧璧，安徽定远人，1945年在延安与林伯渠结婚）1961年写信给中央，反映林伯渠逝世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文稿处理问题）需要解决，上报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发现其笔迹与8年前寄给江青的匿名信笔迹相似，于是打电话告诉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过公安部专家鉴定，这两封信笔迹为同一人所写。杨尚昆和徐子荣同朱明进行谈话，她痛快地承认8年前给江青的匿名信是她写的。组织上还没有来得及处分她，她就立即在家中自杀（吃安眠药）身亡，被中组部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江青对公安部门迟迟未能侦破这一案件曾经表示强烈不满，案子破了，又怀疑朱明作案公安部门早就掌握了，迟迟不破，是为了保护林伯渠的声望，保护朱明。

“四人帮”被粉碎后，朱明亲属申诉，经胡耀邦批示，由中央组织部复查，结论为“给江青写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在第一封匿名信还没有侦破，时隔5年，第二封、第三封匿名信又出现了，还是披露她的历史问题，还是寄给她本人。江青的愤怒可想而知。

1959年3月24日，江青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从北京乘飞机到达上海，入住上海市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在柯庆施安排下，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和公安局局长黄赤波陪同。上海市委认真检查为毛泽东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锦江饭店会场安全保卫和毛泽东饮食起居的准备情况。江青对上海的安排很满意。3月26日，江青心情特别高兴，在房间里拉起二胡，自拉自唱。正在得意时，锦江饭店办公室主任敲门进入，给她送来一封“亲启”信。她感到疑惑：没有人知道她住在这里，怎么这么快就有人给她寄信呢？她打开信封拿出信纸读了起来，只几分钟时间，就气得晕倒在沙发上。她的随行人员和饭店服务员慌了手脚，不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江青苏醒后，马上镇定下来，若无其事，搪塞说可能是低血糖，吃块饼干就可以了。说着，真的拿起两块饼干吃了起来，骗过了随行人员和宾馆服

务人员。

当晚，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抵达上海，住锦江饭店，来看望江青。江青将匿名信交给康生阅读。康生读后说：这是一起特大反革命政治案件。3月29日，周恩来抵达上海，江青和康生一起向他汇报匿名信事件。周恩来马上把罗瑞卿叫到自己房间，限他10天内破案。罗瑞卿不敢怠慢，立即与在北京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通电话，安排刑侦专家火速来上海，和上海市公安局一起破案。第二天，公安部刑侦专家宋添福率领两位破案能手飞抵上海，和公安局20多名刑侦专家组成专案组，柯庆施点将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为专案组组长。八届七中全会定于4月2日开幕。4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飞抵上海，江青随中央领导到机场迎接。她离开宾馆时间不久，当天寄往锦江饭店转江青的第二封匿名信又到了。专案组不敢打开信件，交给江青。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前一封匿名信是从上海寄的，于是专案组一分为二，立即派人赴北京调查。

由于江青只给专案人员看信封，信的内容不让看，专案人员无法判断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目的、语言习惯、地域特征和其他信息，对破案非常不利。专案组要求黄赤波向江青反映，黄赤波不敢，向柯庆施汇报。柯庆施也不敢对江青说，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罗瑞卿和江青谈。罗瑞卿打着周恩来旗号和江青面谈。江青答应考虑，但是第二天又拒绝了。罗瑞卿只好向周恩来汇报。于是周恩来亲自出马，找江青谈话。江青无奈，只好将信纸交出。专案组紧张工作了10天，一无所获，过了限期。周恩来询问罗瑞卿，案子为什么破不了？罗瑞卿请求再延长半个月，一定破案。

案子破了（破案详细情况省略），作案人为东海舰队的一名海军中尉，名叫金柏麟，现年28岁，是一名烈士遗孤，由姨妈史文慧收养。史文慧是上海评弹演员，认识江青，了解她的历史，平时和金柏麟议论过江青，对其产生影响。江青入住“法国俱乐部”时，被偶然路过那里的金柏麟认出。金于是用打字机打出两封信，一封从上海发出，一封到北京出差从北京发出。破案后金柏麟以泄密罪被军事法庭判刑两年，送大西北劳改农场劳改，文革中躲过了江青追杀。文革后被平反。

揭发江青历史问题的3封匿名信都不是寄给党组织，而是寄给江青本人，可见寄信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党组织去追究她，而是为了发泄个人不满情绪，警告她：你不要太张狂，不要忘了你在上海滩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其实，揭露别人私生活的匿名信，分量是很轻的，而且是寄给本人，要是发生在一个普通演员、普通人身上，可以一笑置之；要是发生在现在，披露出去，反而让人出名。匿名信上写的那些内容，在解放前的报纸杂志上随处可以查到，无秘密可言，所以写匿名信的人根本构不成反革命罪、泄密罪，可它却偏偏发生在第一夫人身上，惊动了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大员，花费了大量民脂民膏，案子破了，江青却不满意，因为有更多参与破案的人了解了她那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使她的“国母”形象受损。

文革期间，反革命标语、传单案件占了整个反革命案件的90%，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对着江青的。为了不使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知道她的历史，维护她“光辉”的形象，使知道她的历史真相的人闭嘴或消失，就成了她的主要任务。而这时她的权力无边，想整谁就整谁，所以就上演了一幕幕迫害公安干警的大戏。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

~~~~~

【文革一幕】

## “文革”中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

• 王春南 •

### 一、遍及全省的“五·一六”清查

“文革”期间，江苏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江苏省革委会、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一手抓煤，一手抓“五·一六”。他在苏南，手指到哪里，就让人挖到哪里，挖出了几处“鸡窝煤”（储藏量极小），成为笑柄。他在全省抓了几十万“五·一六”分子，“战果”辉煌，搞得民怨沸腾。

什么是“五·一六”？1970年11月30日，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对此有这样的说明：“什么叫‘五·一六’？‘五·一六’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罪大恶极，搞资本主义复辟，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江苏省搞清查“五·一六”运动，把突破口选在南京大学，因为江苏两大派主要头头都出在这所大学。吴大胜向南京大学派出了以省革委会常委迟明堂为组长的“调查组”。北京的审查对象（主要是“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审查对象）咬到南京大学的什么人，南京大学的这个人马上就被关起来；南京大学的审查对象咬到了江苏的什么人，江苏的这个人也马上被关起来。就这样，吴大胜用南京大学的清查带动全省的清查。调查组在南京大学抓出了多得吓人的“五·一六”分子，该组一位副组长说：“南大的‘五·一六’，多得可以用火车装。”南京大学抓“五·一六”的“成果”很快扩大到全省。

我当时所在单位新华日报社，清查“五·一六”的声势远不能跟南京大学相比，但还是搞得“轰轰烈烈”的。

新华日报社革委会主任说：“新华日报社肯定有‘五·一六’，不要上‘没有论’的当。仗一定要打到底，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是反革命，都要挖出来。眼睛要睁大一点，不要睡觉。打仗是要冲锋的，钻防空洞不行。”

新华日报社第一个被作为“五·一六”关押的，是一个已经下放外地的原记者，姓汤。紧接着，报社原一派组织勤务组成员及战斗队长，不是被关进所谓“学习班”（私设的牢房），就是被“触动”（点名批判，勒令检查），很少有幸免的。报社内关不下这么多人，就关到南京农学院和江苏教育学院校舍（当时这两个学校都已迁走，空出了校舍）。有一个关在报社内的审查对象，纵身从三楼跳下，以致一腿残疾。原另一派组织被关、被“触动”的人较少，但有一位女同志，在恐怖气氛下，吓出了精神分裂症。

### 二、从运动动力到运动批判者

我在报社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曾是所谓“小分队”（由领导指定建立的负责看管和讯问审查对象的小组）成员，是运动的“动力”，曾参与讯问审查对象一次，与审查对象家属谈话一次。后因评论组工作需要，脱离“小分队”。

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关进了“学习班”。几乎每个单位都有私设的牢房，而且人满为患。当时我就想，有这么多“五·一六”吗？是不是运动出了问题？

这期间，我经历的一件事使我深切感受到了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恐怖气氛。有一次，

南京大学大操场上召开全市清查“五·一六”运动“宽严大会”，我也参加了。到会者有数万人之多。各单位的审查对象也被押去了。为防止别人认出他们，有的被蒙着脸，有的被装在麻袋里，放在小推车上。开会之前，有人指着前面正在跟别人交谈的原南京大学干部徐某对我说：“你看他现在还很轻松。有人交代的‘五·一六’名单上有他。”开会时，乱交代的、乱咬人的，被作为“态度好”的典型而当场宣布“从宽处理”。不肯乱说、乱咬的，被当作“抗拒运动”的典型，当场宣布“从严处理”。有一个学生，据说“态度恶劣”，又据说他有“想当国防部长”的“反动言论”，是个“野心家”，当场宣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戴上手铐押走。大会进行之中，有一人从一幢教学楼的窗口跳下，当场殒命。见此情景，我清醒了许多，不由得思考：这场运动，为什么会搞到如此恐怖？历史上有用这种方式搞运动的吗？

多少年后读到康生的《抢救失足者》一书（即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中央直属大会上所作关于“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方才知清查“五·一六”运动跟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方式、方法颇为相似。

这里仅谈两点：一、都是夸大“敌情”。康生在书中说道：“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四月十号起，我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在康生眼里，在延安，日本、国民党特务如麻，遍地皆是。在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五·一六”也被说得无处不在。省革委会调查组进驻南京大学之初，尚未进行调查，就凭主观臆断，说什么“北京有‘五·一六’，南大一定有‘五·一六’，不仅有，而且面广量大，根深线粗”。

二、都是诱骗人坦白。康生在书中说：“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的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当时很多人上了康生等人的当，纷纷交代，诬称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延安“特务”成千上万。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鼓励坦白，鼓励乱咬人，以致咬人成风。南京大学有的审查对象，一咬就是几十人，以致调查组组长迟明堂也被咬到。三人成虎，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随即将迟明堂也关了起来。吴大胜说：“我也被人咬了。”

当时我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不满和愤怒只能压在心底。但遇到适当时机，这种不满和愤怒，就会化为批判的文字。

### 三、几张大字报激起的千层浪

吴大胜等人以“支左”（军队干部支持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主政江苏七年多，积怨甚深。江苏的干部、群众对“文革”的怨恨都集中到吴大胜等人身上，都盼望着他们早点离开江苏。

1973年和1974年，吴大胜等人流年不利。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会议上先后五次发表讲话，谈到八大军区司令要对调。还讲到“五·一六”问题：“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毛泽东的讲话，对吴大胜来说意味着两点：他背靠的大树南京军区首长将离开南京军区，他将成为断线的风筝；被他打成“五·一六”的几十万江苏干部、群众，因毛泽东讲话点到了“五·一六”问题，迟早会向吴大胜算账。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其本意是借“批孔”敲



打“周公”（周恩来）。江苏的干部、群众接过了“批林批孔”的旗帜，展开了对吴大胜等人的斗争。就在这时，1974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4号文件，批评了吴大胜等人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问题，无异于给了江苏的干部、群众一个批判吴大胜的有力武器。随着批吴运动的兴起，吴大胜等人在江苏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就是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批评时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政工组组长蒋科的。几年前，我跟蒋科有过一次接触。大约1968年冬，我与新华日报社一位姓韩的军代表一起去找他审查一篇社论校样，领教了他的跋扈。1974年3月初，我听到了蒋科关于“批林批孔运动”一次讲话精神的传达，大为反感，认为是奇谈怪论，于是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编辑部大楼（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旧址）大门旁墙上。

这张大字报虽然点到了清查“五·一六”问题，但当时我还没有做好就此问题系统揭发的打算。在此之后，我经常跟报社同事王晓智交换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看法。他原本也是所谓“小分队”成员，对清查运动渐生恶感。两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那时我33岁，王晓智31岁）越谈越激愤，越谈越想用大字报抒发胸中的积愤。

我是学历史的，又在读高一时经历过“反右”运动。我所在的江苏省丹阳中学不但在教师中，而且在高中部学生中展开了“反右”斗争，因言语犯忌而遭到批斗的，竟有十五六岁的未成年学生。这让我在小年纪就领教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政治运动的残酷。如果我抓住“五·一六”问题继续做文章，我就必然会成为挨“枪打”的“出头鸟”。想到这些，我竟然不害怕。这是因为多少受了毛泽东大力提倡“造反精神”的影响；因为处在那个年龄段，畏惧要少一些；因为自己毕竟有血性，有正义感，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着父亲的血，当年他抛妻别子参加抗日战争，并且一去不回。我想，为那么多受迫害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讲几句公道话，即使自己做出牺牲，也是值得的。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有责任向社会讲真话。我的声音很微弱，但若能唤起受害者起来控诉吴大胜等人，将会形成很大的力量。

3月18日，我与王晓智第一次合作，写了一张题为《宣传部长在宣传什么？——评周特夫同志在高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的大字报（我起草，王晓智修改）。周特夫当时是新上任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上任伊始，就为吴大胜等人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辩护，说运动“大方向正确”。我们在大字报中逐条批驳了他的说法。这份大字报洋洋五六千言，因为是新华日报社编辑点名批评省委宣传部长周特夫，公开批评吴大胜等人在江苏发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并且又贴在省委大院内，所以带有一定的爆炸性。

在此之后，同事余华明加入进来，合撰了《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不容回避》《纵观江苏深挖“五·一六”之战——三评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吴大胜的下场和“深挖”的教训》等五张大字报。

其中《纵观江苏深挖“五·一六”之战——三评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由王晓智起草，我作修改。篇幅较长，约4.5万字。自4月18日至5月15日陆续公布。之所以称清查“五·一六”为“深挖”运动，是因为吴大胜等人宣称，对“五·一六”要“深挖细找，一个不漏”。这张大字报的材料主要来自跟我们有联系的各地革委会通讯报道组成员、清查运动受害人，以及南京大学校友，涵盖面广，涉及全省绝大部分市县的运动情况。

大字报除《前言》《后记》外，共分七部分：一、江苏“深挖”之战的背景；二、江苏“深挖”之战中对敌情的估计；三、江苏“深挖”之战的舆论准备；四、江苏“深挖”之战的打击目标；五、江苏“深挖”之战的策略手段；六、江苏“深挖”之战的“战果”；七、江苏“深挖”之战的方向路线。

《前言》写道：“从一九七零年四月至一九七三年初，江苏省军区政委吴大胜同志亲自指挥，动员江苏省几百万人，从学校、机关，到工厂车间，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打了一场为时四年之久的深挖‘五·一六’之战。四年之中，数次动员，春夏秋冬，连续作战；声势之大，规模之巨，范围之广，前所未见。”

之所以称吴大胜“政委”，而不称“书记”，是讽刺他作为军人，不会指挥打仗，却会指挥抓“反革命”。

对我们的几张大字报，作家杨守松的《在劫难逃》一书（稿本）中有如下评论：

“‘二王一余’（即王晓智、王春南、余华明——引者）及时贴出揭露吴大胜的大字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触目惊心的事实把全省四千万人民的义愤激发起来了。他们的大字报被全省各县市传抄张贴，而各地深挖的事例和数据又雪片似的飞到他们手中。不可一世的吴大胜现在四面楚歌了。其实，他们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严密的。错误的武器，批判了错误的路线。”

我同意杨守松说的“他们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严密的”这句话。武器固然不严密，但不妨害对清查运动真相的揭露。事实本身具有震撼力。

1974年，江苏镇江市一位姓王的教师（“文革”后当上了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曾几次给我来信写道：“我清楚地记得，当《宣传部长在宣传什么》一文于大市口贴出时，是怎样震动了整个镇江城的。我曾用四个字来形容人们看您这份大字报的盛况，叫做‘观者如堵’。从清晨到傍晚，你去他来，观者连日不衰。我当时就是成千观者中的一个。……许多人读过您的大字报后，低回良久，不愿离开。有的一连读了三四遍还想读。”“我总觉得您的大字报对镇江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偶一日，我傍晚下班，路过大市口，见一份大字报下人头攒动，即下车一看，原来是您的又一份大字报。”

南京市的王桂森在无锡出差时，来信谈到了我们的大字报在无锡引起的反响：“大字报主要贴在‘城中公园’内，您的三份大字报在无锡引起轰动。我在上面又用钢笔注明：此大字报早已贴在省委（大院）。”

江苏金坛县革委会通讯报道组来信说：“请设法寄一套你们几位采写的有关揭发江苏深挖‘五·一六’的文章给我们，以便组织学习，并印发给公社干部。”

#### 四、听省委第一书记彭冲谈“五·一六”问题

江苏省委、省革委会中的领导彭冲、许家屯（他们都是“文革”前江苏省委书记）对我们的大字报是支持的。1974年5月，彭冲曾托新华日报社革委会主任樊发源带口信给我们：“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樊发源在新华日报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彭冲的口信。

1974年5月10日下午，许家屯到新华日报社布置撰写次日见报的拥护中共中央1974年14号文件的社论，即《对江苏省委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致中央电报的批复》，文件批评了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等人。吃晚饭之前，他在编辑部大楼二楼一间房间对我说：“你们的大字报调子不高。我的调子比你们高。我主张吴大胜的问题要揭开来看，揭开来说不定是资产阶级专政呢。”又说：“你们要注意照顾苏州人的情绪。”他说的“苏州人”是指苏州市当时的负责人华林森。华林森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与我们观点不一致。他认为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搞对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缺点只是面宽了一些。当时我们对许家屯非常尊重，他的话

影响了我们的观点。原来我们认为吴大胜在清查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多数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理解，许家屯是鼓动我们将吴大胜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问题上纲为“资产阶级专政”，上纲为“敌我矛盾”。

因感念彭冲同志对我们写大字报的支持，1975年春，我去他府上拜访了他，去时拉上了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魏辅政。彭冲夫人开了门，把我们引进会客室。当时彭冲已升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谈话半个多小时，涉及清查“五·一六”问题。他对我们说：“江苏清查‘五·一六’，不算徐州地区，被定为‘五·一六’的有13万人。”江苏当时共有七个地区，除徐州地区外，还有苏州、镇江、扬州、南通、盐城、淮阴六个地区。徐州地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据程中原《徐州整顿：一九七五年整顿的突破口》一文所述，“徐州市搞‘五一六’整了六千多人，徐州地区整了十二万人”。

## 五、诉不尽的冤屈和荒唐

江苏全省清查“五·一六”，被株连的人数以百万计，被定为“五·一六”的，多达数十万。

江苏电视台原台长丁群在《冤狱遍地的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文中，向我们公布了如下权威信息：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苏省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13349人。这就表明，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比当年反右派斗争的伤害面，还要大20倍。”

丁群台长又在《说不尽的残忍和荒唐——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文（撰于2005年，未刊）中写道：

“在长达四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南京大学被莫须有地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师生员工达1560人，占当时师生员工总数（495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多达28人。”

当吴大胜还坐在江苏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时，我们对清查“五·一六”运动说了一个“不”字。当吴大胜还是一只真老虎时，我们摸了他的屁股。

吴大胜被调离江苏，他纵然想报复我们，也没有机会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路过南京宁海路他家（一幢黄色的、民国时期建造的别墅）附近时，见到了他。我喊了一声“吴政委”，他应该是认识我的，但他神情木然。我说：“我原来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叫王春南。”他依然没有反应，看来已把我这个“冤家对头”彻底地遗忘了。

倒是许家屯记住了我。我从有关渠道得知：有人拿着我起草的最后一份大字报《吴大胜的下场和“深挖”的教训》打印件去找他，指着一处地方对他说，他们在大字报中影射你。原来这处地方写着：要把吴大胜当作一面镜子。看来许家屯是相信了告状人的挑拨。许家屯很快代替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这对我们三人意味着什么，我后来才体会出来。

□ 原载《世纪》2015年第1期

~~~~~

## 【荒唐年代】

### 江青改戏闹革命

• 陈徒手 •

1966年7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讲话中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其中有一句大实话，就是江青长期“不出头露面”却做了很多工作，像批《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重大事项，她都实际参与谋划，投入颇深，但习惯性地隐身于幕后。

1962年江青奉毛泽东指示，频繁到各地下剧场，自称观摩了一千三百多出京剧剧目，得出结论是“剧目混乱，毒草丛生”。她在1964年7月有关“京剧革命”讲话中，曾坦率地承认：“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观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没有人看的。”从此时起，江青已经直接插手戏剧事务，譬如要求禁演京剧《海瑞罢官》、催促中宣部停演鬼戏、停演香港影片，组织文章批《李慧娘》等。她仰仗毛的权势，着力显现她的发言分量，居然一次招来中宣部、文化部四个部级领导谈话，指出舞台、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大泛滥的问题。文化高层官员当面唯唯诺诺，会面后置诸高阁，从根本上漠视了江青发出的预警信号。

1963年11月，江青开始正式介入“京剧革命”运动。按文化界“文革”造反组织表述，当时北京京剧一团为“旧北京市委严密控制”的文艺团体，江青“勇敢打入”并指导排练《芦荡火种》（后经毛泽东改名为《沙家浜》）。同时，从十二种《红灯记》各地剧本中，选定上海爱华沪剧团的本子交给中国京剧院改编排演。12月，江青建议由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团排演《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由此拉开文化革命的帷幕，其彰显的首创意义被日益放大，正像戚本禹后来所形容的那样，江青“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第一次使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大放光彩，长期统治艺术舞台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开始被赶下台了”（见1967年5月23日纪念延安文艺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发言稿）。

“文革”期间流传的江青讲话文本中，较为人们熟悉的一段是她第一次接见北京京剧团青年演员时的厉声批评：“解放十几年了，还是演地主头子、地主婆，不可耻吗？”“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在场的青年演员、《沙家浜》指导员郭建光扮演者谭元寿于1966、1967年先后在报上撰文，回述了江青那次谈话诸多“义愤填膺”的要点，譬如说道：“我们今天舞台上还演鬼戏，还演帝王将相，这还算得上什么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你们剧场观众这样少？有青年人没有？你们演老戏完全是脱离了广大工农兵群众。”江青说了两句话后来成了《沙家浜》剧组屡用的代言词：“要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要做个披荆斩棘的人。”

江青此时说话较具冲劲，言词锐利，出其不意。她见到芭蕾舞剧团演员时，立即告诫道：“不要当外国人的奴隶，要走自己的路。”“要敢于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1964年1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参会人员谈了现代戏存在一些“非驴非马”的现象，提倡古典、现代“两条腿走路”，对旧东西不要过于“粗暴”。江青在会上颇有针对性地表态：“就是要允许一段非驴非马的东西。”“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了。”她还严厉批评道：“十四年的工夫，还搞古时的感情，这是个立场问题。”（见1967年7月《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英勇斗争大事记》）在高层人物齐集的场所，江青表露了咄咄逼人、毫不退让的气势，初步显示了她在文艺事务上的权威性和誓死斗争的色彩，她这种不妥协的“露峥嵘”

方式一定让与会者难以忘怀。

江青磨戏的韧性在当年是出了名的，她拍板定下的事情绝不容许含糊应付。她指示《红灯记》剧组一定要突出李玉和这个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但剧组却有人主张“三代人平分秋色”，甚至用反面人物的大量舞台活动来排挤李玉和。《粥棚脱险》这场戏，被认为是《红灯记》中描写李玉和从事地下工作，同群众接触的仅有的一场戏，江青觉得可表现李玉和“机警智慧”。导演阿甲却觉得粥棚“没有戏”，以“照顾京剧特点”为由砍掉这第三场戏，让李玉和在第四场戏中把粥棚脱险的经过追述出来。江青得知后大为不满，坚持一定要恢复这场戏，认为删掉这一场“对李玉和的形象有损害”。她还批评粥棚戏“搞得太松，不紧张，没有真实感”，建议密电码应放在饭盒内，红灯要挂在左边柱子上，李玉和被搜查下场时不要唱等（见1964年5月23、31日江青《对京剧〈红灯记〉排演的指示》）。

在第一场戏里，编导让李玉和用大衣遮住脸，在紧张的音乐气氛中踉跄走上舞台，哈腰驼背。江青恼怒地责问：“出来那么紧张干什么？”确定第一次亮相必须要“英俊高大”。李玉和扮演者钱浩梁（浩亮）曾在1967年5月27日刊发的文章中讲述了江青的修改方案：“让李玉和手提红灯，健步上场，然后走到台前，面对观众，观察情况。给人一种安详、坦然的感觉，同时，又表现出革命的警惕性。”（见《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原来第五场戏时，李玉和回家后发现出事，神情异常紧张，在台上踱来踱去，好像没有主意。编导还故意安排李玉和偷酒喝的情节，说这样才有生活风趣。江青对此极力反对，改排成李玉和一进门看见会上的纸蝴蝶，知道出事了，立即意识到可能被捕，便马上给李奶奶交代任务。在壮别时，再让老奶奶请李玉和喝一碗鼓舞斗志的酒。在“斗鸠山”一场时，编导原安排“李玉和”固定在舞台一角，让反面人物鸠山满台跑来跑去。江青指出，应当匀出舞台地位，让李玉和有充分活动的余地。她还明确挑明，李玉和受刑后应再次上场，编导们却以“没戏”为借口，迟迟不肯照办，相反却让叛徒王连举在叛变后多次出场。江青坚决不允，还去掉初排时鸠山在歌妓簇拥中狂笑的场景，执意要让李玉和在受刑后忍住浑身剧烈的疼痛，双手扶住椅背，横眉怒目痛斥鸠山。她说，李玉和虽然受了严刑，腿上负了重伤，但是，坚强的革命意志鼓舞着他，决不能在敌人面前倒下。

时常置身于剧组的场景中，从彩排到正式公演，江青的思维异常活跃，对整部戏可说是全方位地修整。大到情节的安排，譬如监狱戏（第七场）要全部改动，不要王警尉伪装游击队骗取密电码的戏，舍去周师傅铁铺一场等等；小到一系列琐碎的细节，如所有念唱中的“小鸠山”都改为“贼鸠山”、李奶奶的服装补丁要补在肘上、“今日斗敌顽”的“顽”字要换个仄声字、奶奶讲家史讲到“砰地一声”手拍桌太响、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第五场特务搜查要搜得内行些，等等。从5月到7月，经过剧组整理的江青修改意见就达到了一百三十多条，条理分明，操作性强，显示了她足够的舞台经验和精细的专业度量。

江青有时愿意给人物增改台词，譬如她要让鸠山说这样的话：“一个共产党藏的东西，一万个人也找不到”，李奶奶讲家史时“革命出世了”改为“共产党出世了”。1965年《红灯记》在上海演出，一天深夜编导们早已在房间躺下休息，江青突然特地打来电话说，她已经考虑好了一个修改细节，将“李玉和救孤儿东躲西藏”这句唱词改为“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见1969年3月22日驻中国京剧团工人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京剧团革委会《举红灯破黑线大闹京剧革命》）。

出于自己演出的经验，江青对京剧的曲调十分敏感，屡屡指出某些曲调改得不舒服，要求现代京戏不要乱动传统。她希望李玉和的唱腔设计是激昂慷慨的，建议唱“二黄”、“倒板”、“迥龙”和“原板”等。

光是小铁梅的舞台表现内容，江青就指导得格外详细。她一再强调，铁梅的成长要有层次，她只是十七岁的孩子，不要懂得太多。铁梅拉窗帘看人、关窗帘等，都要十分小心机警，钻炕洞回来要顺手将炕整理一下，讲话要有秘密气氛。原排演时，铁梅从刑场下来骂鸠山“我撕下你的狼皮”，江青要求取消这句话，认为铁梅此时是神情傻了，应是“慢步凝神地跑回去”。公允而论，江青考虑到剧中人物的实际年龄特点，设身处地，没有一味地拔高，所提的这些修改意见较为平实。

江青与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剧组的关系最为纠结，随着排演的深入，江青与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明暗两方面的较劲越来越升级，政治性的恩怨日益严重。一出《沙家浜》的排练，竟演变成了“文革”前夕高层权力斗争诡异的前哨战。受彭真指令、奉命陪同排戏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深感江青横行霸道，无事生非，把别人当奴隶，比西太后还坏（见李琪1965年致彭真信稿）。他自己感伤而道：“得罪了夫人，害了市委。”

1963年底，江青为北京京剧团亲自挑选沪剧《芦荡火种》剧本，并特意把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演出，便于北京演员就近学习观摩。在江青看来，《沙家浜》有一个天生的不足，就是把武装斗争和秘密工作的位置摆得不适当。“文革”中首都文艺界造反组织也多次撰文批判，认为夸大地下联络员的作用，企图借此抬高刘少奇、彭真之流“地下党”、“白区工作”的身价。在剧中积极活动的是地下工作者，而新四军官兵反而处于被动的、受保护的地位。

在江青和批判者看来，本来阿庆嫂的戏份就比较热闹，指导员郭建光的形象则较为干瘪。郭建光扮演者谭元寿在1967年5月14日见报文章《用毛泽东思想塑造英雄形象》中写道：“改编过程中，又加了一场阿庆嫂欺骗敌人、取得信任的‘假报’，并加重了阿庆嫂在胡传魁结婚喜堂上安排布置的戏，这样就成了阿庆嫂在那里指挥一切。应该说，这已经由缺点走向错误。”毛泽东1964年7月23日应邀观看此剧，江青随即根据毛的指示，强行要求突出武装斗争，消灭胡传魁（按：剧中忠义救国军司令），解放沙家浜，应当是新四军从正面打进去。要删掉别的场子，腾出篇幅来表现新四军。因此剧情被迫有了较多的删减，像“三茶馆”、“刁小三进芦荡”等新加的情节，经过长时间的拉锯还是被全部砍掉。有一回江青看到彩排的戏未照她的意见修改，不怕得罪彭真，坚决要求停演退票。

京剧团造反组织的材料揭露说，旧市委疯狂抵制江青的指示，李琪亲口说：“阿庆嫂的篇幅一定不减。”甚至还埋怨说，“‘假报’一场很有戏，不要把好好的一个戏改坏了……”由于对戏份的不满，旧市委不给剧场排演，不给服装，不好好地改剧本，不认真设计唱腔，一直顶了四个月上不去。相反，江青豪爽地表态：“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好。”（见1967年7月新北大公社《披荆斩棘第一人——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诞生》）

江青尤其对郭建光的音乐形象关注甚多，她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扮演郭建光的谭元寿，谈自己最新的想法。1965年1月毛泽东头天晚上给徐寅生《如何打乒乓球》作了批示，江青第二天就把批示抄送给谭元寿，让他领会批示的精神。她在剧场一遍又一遍地听“听对岸”那一段唱腔，要求有层次，不要“铁板一块”。她说，“听对岸”的“听”字要唱得挺拔，“村镇上乡亲们要遭祸殃”那几句要唱得有感情，要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要像领导同志那样，连每天的降雨量都关心，要有那种感情。她提出新四军伤病员要帮助老乡收稻子，郭建光在沙奶奶面前像个孩子，在她面前要调皮，要有搔脑袋的动作。

主要演员穿的服装，甚至补丁补在哪里，阿庆嫂裤子镶什么边……江青都要一一过问，连新四军草鞋上的红绒球都是她出的主意。为了“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一句唱词，她亲自调查故事发生地常熟那个时候是不是早稻成熟的季节，发现与事实不适，才改成“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琢磨“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唱词时，她生怕有误，特地了解常熟那一带有没

有山。

江青这样夜以继日的投入和内行的修改，是彭真、李琪他们这样高级政治干部所难以达到的。政治战固然有晦暗阴沉的一面，也有人性缺失的一面，江青也有她势利、霸道、专制的强势一面，更有她不讲理、蛮横、不留余地的处事方式。但在抱病中还如此倾情介入，第一夫人也有这样不一般的超常表现，也定会让后人惊讶不止，感慨良多。

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江青做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讲话，政治上高谈阔论，发挥酣畅，其间却很少提及具体的剧目，提到几句的就是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以此作为阐述的例子。她说，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现在把定河道人的戏砍掉一场，把杨子荣和少剑波突出起来，反面人物就相形失色了。

江青说的是实情。原编导总嫌主人公杨子荣“强悍粗犷”不足，要刻意渲染他的“土匪劲头”，突出“传奇色彩”和“惊险场面”，甚至要把这出戏搞成传统模式的“连台本戏”。江青顶住了“让反面人物统治舞台”的排演方案，主题思想确定为宣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砍掉定河道人等一些反面人物的戏份，增加了“深山问苦”和“发动群众”两场戏。在“计送情报”一场中，江青指示，把送情报的环境由一个昏暗窄小的山洞改为一个开阔光明的场所，让杨子荣形象更具明朗。“献图”一场，她出主意说，正当群魔欣喜若狂的时候，杨子荣要一个箭步，跃上威虎厅高台，占据舞台最突出的地位，而把敌人甩向舞台的阴暗角落。这种场面调度，可使敌人显得十分渺小。

京剧名家周信芳曾对京剧现代戏有所议论，说了类似“京剧现代戏像白开水”、“话剧加唱”的闲话，惹得江青大发其火。在1967年5月24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大会上，戚本禹公开引用了江青的当时评述：“这些人简直是无知！白开水有什么不好？有了白开水，才能泡茶，才能酿酒。没有白开水，活都活不了。‘话剧加唱’又有什么不好？从来的京剧都是话剧加唱。不说不唱，哪儿来的戏？”戚本禹还冷嘲热讽地说道：“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不服气吗？请拿最好的旧京戏同我们的样板戏比一比吧！旧京戏哪一点比得过我们？究竟是我们现代戏的工农兵演得美？还是旧京戏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演得美？就是艺术性也远远比不上我们，我们的现代戏哪有旧京戏的那种拖拖拉拉、松松垮垮的邋遢样子？”（见纪念大会讲话稿）

1964年8月初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试演，江青即来观看，第二天兴致不减，又来到剧团同编导、演员座谈三个小时，不同意外界所说“艺术水平太低，太乱，不能见外国人，外国人不会承认”的评价。在当年10月公演之前，她又接连到剧团七八次，从表演到化妆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她对最初剧团拍摄的剧照觉得不理想，不顾身体患病，坚持到剧场亲自拍了两天剧照，指点演员站位、舞姿，布置照明，直至图片的构图、光影、造型满意为止。

为了突出主要人物，江青下决心删掉红莲这条人物线，把她的戏各分给洪常青、连长。她一再强调，琼花、洪常青、连长三个人的戏再突出一些，“现在琼花的形象在舞蹈造型上不太强烈，她很倔强，要给她强烈的动作，表情上也要注意……现在弱女子的动作多了一些。”“琼花要有特写，要靠前一些。琼花要有这样的内心，开始反抗是个人，然后到了军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琼花要野一些。”“有些地方缺少层次，人物形象也缺少层次，琼花的转变也是这样。”（见江青1964年9月22日《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排演工作的指示》）她一再梳理剧情，对动作、乐句、置景逐一地掂量。譬如第二场中洪常青把帽子一摘，投奔娘子军的琼花认出了他。江青就特意交待在第一场“常青指路”中，洪常青要找机会摘帽子“亮相”，为第二场相识做呼应。

江青对演出现场的服装质量一向很在意，注重舞台呈现的效果，有着女人特有的精细和敏

感。她提出，洪常青要讲究造型，白衣服是否再做一套，要挺一些。果然，第三场以华侨富豪身份出现的洪常青衣着华丽，西装革履，白衬衣合身，在那个年代看来都是耀眼之举。她说：“灰衣服应突出红领章，红用得不突出，要换，现在不鲜艳。琼花也是，可以考虑用点金边。”她强调，不调和的衣服要换掉，黎族舞的服装像蛇，裙子花边太自然主义了。黎族妇女穿黑的多，但可突出红颜色。把服装统一安排一下，每场的颜色要协调，从冷到暖要有中间颜色。她指出服装设计者不懂颜色，只要有一点不那么协调就整体效果不好（见江青1965年1月17日《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排演工作的指示》）过了一周左右再去看戏，江青发现娘子军演员的衣服褪色了，军装的质量已没有原来的好，就告诉剧团领导，“要做两套经常洗染”。

相比较之下，在排演过程中，江青对《红色娘子军》剧组用了较多的批评口吻，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看出她在后期阶段心态有些急躁和焦虑，少了前期的那种耐心和谦逊。譬如她会指责说“过场音乐稀稀拉拉”、“景完全把人夺了”、“灯光搞得很凶”、“没有着重戏剧性，戏散了”等等，用语偏向严厉，有时让人一时没法接受（见1964年1月24日《江青同志对〈红色娘子军〉排演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排演之中江青几次主动提及自己的个人经验，供演员们排练时参考。如她嫌琼花手捧洪常青给的银币表情不够，就告诉演员：“你们不知道旧社会，我小时候给一个铜板就不容易，洪常青给她的是银毫子，她要感动得流泪，这地方是有戏的。”（见1964年12月17日《对〈红色娘子军〉排演意见》）在讨论“琼花参军”一场时，她启发道：“我未到延安时，心中早就向往着延安，当远远地看到‘延安’这两个字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琼花看到红旗也应该这样。”（见1967年7月《革命芭蕾舞的红旗要我们来扛——记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诞生》）不回避过去个人的挣扎经历，说戏能感同身受，感染在场的编导演员，显露真挚之情，从第一夫人的尊贵身份来说，已属难得。

“文革”中报刊爱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江青对京剧革命的独特贡献，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表述也不算过分，正像陈伯达1967年5月所夸奖的那样：“这几年，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那几年间正是江青忘我投入、强力主导的领导创作时期，样板作品的质量一时也达到高峰，只是江青后来权势膨胀，时过境迁，她自己也无法回复到那样一个舍命追求艺术的境界。

□ 原载《东方历史评论》 2015年1月

~~~~~

## 【人物春秋】

“文革”中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

• 钱 江 •

### ◇ 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

奉命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的陈伯达实际上抵达了政治生涯高峰——任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排名位居江青和张春桥之前。而陈的资格远胜此二人，早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被称为“革命理论家”。

在解放战争中，唐平铸是刘邓大军主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的宣传部长，进军西南时任师政委（师长尤太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从西南军区调解放军总政治部，是《解放军报》的创办人之一，担任副总编辑。“文革”爆发前，原总编辑华楠去职，唐平铸已是解放军报



社实际上的负责人，参与或主持了军队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撰写。

“文革”爆发之际，毛泽东不满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刘少奇、彭真关系趋向密切，决定迅速撤换他。跟随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成员有6人：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总政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军事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国际组编辑），另有2人的名额由上海市委选派，当时尚未确定。

夺权当晚，陈伯达修改、审定了钱抵千和朱悦鹏、尚力科急拟的6月1日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工作组大部分成员是军队干部，所以刘志坚增派唐平铸和老搭档、《解放军报》副总编辑胡痴赶去协调。

陈伯达一到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吴冷西即被停止工作。陈伯达宣布，人民日报社有“四大家族”——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这四人就是“走资派”。这实为陈伯达在延安写出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翻版。

陈伯达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不可能管到《人民日报》的具体编务。跟陈前来的穆欣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一周后就离开了。6月8日，陈伯达对唐平铸说，他将在次日（9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让其来代理人民日报社的工作。这也可以被看作陈向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方面示好，或者说表示了信任。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因此，他回到北京后就不断调整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先是6月14日委托唐平铸到新华社宣布，社长吴冷西停职反省。6月19日又由中央工作组宣布，唐平铸担任人民日报社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只过了一天，陈伯达就在人民日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唐平铸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身在杭州，唐平铸就任新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他谈话。但此时的刘、邓身处极度危险之中，唐平铸哪里知道这次谈话会给他带来潜在的危险。

此前，中宣部原部长陆定一已被列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而遭罢免，中央调陶铸担任中宣部部长。

唐平铸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使那里的领导层未断档，但情况极为复杂。陈伯达虽掌控了《人民日报》，但不信任那里的干部，意欲“换血”。唐平铸却发现，除了陈伯达点名要打倒的“四大家族”之外，《人民日报》部门以上领导中，很多人在抗日战争中曾在太行山根据地战斗过，是自己十分熟悉的老战友，不应该将他们都打成“走资派”。

唐平铸在多个场合表示：“我看王揖、安岗、李庄他们表现好，都可以当副总编辑。”“像李庄这样的人，下去劳动几天，马上就可以回总编室工作。”陈伯达知道后很不满意，要唐平铸抄写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醒他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于新任的中宣部部长陶铸，唐平铸认为他曾是四野的老首长，应该主动向他汇报请示。陈伯达对此不满意，认为自己奉领袖之命前来，才是《人民日报》的大主管。

更麻烦的是江青，她屡次在毛泽东面前搬弄陶铸的是非，对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且排名在前极为不满，经常当面讽刺挖苦，弄得陈愤懑不已。而在江青和陈伯达当面冲突的时候，

有时在场的唐平铸感到十分为难，无法表态。

#### ◇ 在政治险境中艰难跋涉

1966年8月28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召见唐平铸和胡痴，说了些勉励之语，还说《人民日报》版面太多了，应该精简。

唐平铸觉得，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刻不容缓，向陶铸说了一下，就赶紧布置了下去。从9月1日起，《人民日报》改为每天出4个版。他没有向陈伯达报告，引起陈的不满。周恩来也觉得事关重大，批评唐平铸不事先报告。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看到减少了版面的党报后改变了主意，于是从9月4日起，《人民日报》又改回了原先版面。唐平铸几头不落好。

唐平铸非常尊重周恩来和陶铸。他们面对“文革”后急剧下滑的经济形势十分担忧，要求唐平铸组织撰写加强生产的社论。事态紧急，乘车欲行的周恩来将唐平铸招呼到自己车上，口授社论的主要内容。唐平铸很快落实，主持撰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等几篇重要社论。

对于唐平铸的做法，1966年8月底后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很不满意，怀疑唐平铸和自己不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有一天，江青和陈伯达当面发生冲突，在一边的唐平铸不便吱声，就低头翻阅文件。江青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大声喝道：“唐平铸，你在看什么？”唐平铸顺手将文件递过去，说：“就是看这个。”江青勃然大怒，叫道：“你怎么这样没礼貌，递送文件要站起来用两只手！”唐平铸明白了，此时挑礼的江青，已经不是当年去延安时，曾经帮助自己接回妻子的那个女青年了。

唐平铸此后的处境更加凶险。与他进行任职谈话的刘少奇、邓小平很快被打倒。1966年12月，陶铸受冲击，随后被打倒。中央宣传部更名为中央宣传组，王力任中央宣传组组长。

1967年1月13日，解放军报社的萧力带头夺权，胡痴被“揪”出来了，唐平铸受牵连立即被打倒，被关押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人民日报社乱成一团。

此事突如其来，陈伯达事先并不知情，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他带着王力、关锋来到人民日报社，说了一通不着边际的话，喊了几句“打倒陶铸”的口号，宣布成立一个“临时编委会”，负责《人民日报》的运转。

实际上，解放军报社被夺权，削弱了林彪控制舆论工具的力量。林彪和陈伯达对突然打倒唐平铸并不认同，还有可能察觉到萧力在军报夺权不仅仅是针对胡痴。1967年2月27日，王力的秘书瞿怀明给人民日报社打来电话，传达关于唐平铸的三点指示：

一、已查明，唐平铸同志对于《解放军报》1月中旬发生的问题，没有责任。二、唐平铸的缺点和错误，根据已揭发出的材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不能采取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三、唐平铸现在可以在《人民日报》参加编辑工作。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社“摇晃”了一下，又出来主持工作，但所处工作环境愈加凶险。他原先的领导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也先后被打倒了。

#### ◇ “揪军内一小撮”提法的由来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武汉，谢富治、王力等也去了，打算解决那里从

地方到军队出现的两大派冲突。没有想到，领袖的意图非但没有实现，还引起了更加剧烈的冲突。群众组织的成员冲到毛泽东住处附近，王力遭到殴打，一条腿骨折。毛泽东一时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后在周恩来安排下乘飞机前往上海。此事件史称武汉“七二〇”事件。

武汉驻军卷入了这次事件，在中央层面引发了对武汉冲突的表态问题。主持人民日报社日常工作的唐平铸感到事情变得非常微妙。

7月22日上午，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到机场欢迎。在候机室里，已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头衔的关锋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唐平铸和新华社的王唯真、主持《解放军报》的赵易亚叫到一起，布置宣传口径。当时，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在场，气氛非同一般。

关锋说：谢、王从武汉回来，这是一个重大事件，要大搞宣传。宣传要点和口径主要是：中央和军委，以及“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接着，关锋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要“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他还讲了诸如“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这样的话。

关锋要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根据上述精神写出社论，新华社发消息。

唐平铸按要求组织人员立即起草社论，当晚送审。

当晚送出社论稿以后（《解放军报》也送了刚拟的社论稿），关锋突然通知唐平铸，社论不发了，社论小样全部烧掉，社论铅版也要拆掉，并且说：“不要把这个精神透露出去。”唐平铸按照指示执行，觉得此事十分奇怪。

没想到三天以后情况大变。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和王力“回到毛主席身边”。前一天的新华社电讯稿中有“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之语，电讯稿刊登于25日的《人民日报》上，而且成为第二条电讯稿的副标题。这还不够，关锋又把唐平铸、王唯真和赵易亚找去说，还是按照机场讲的那个精神宣传，规模也可以大一些，时间持续得更长些。关锋对此反复强调了多遍。

根据关锋的指示，这天新华社电讯稿中有了“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批深、批透”的表述。王唯真告诉唐平铸，这句话是关锋加上、由康生定稿的，康生为此请示了毛泽东。《人民日报》次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并在下方发表陈伯达改定的简短口号般社论《北京支持你们》。

其实，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表述，早在发动“文革”前的“五一六通知”中就有类似语言，即“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中则说：“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

有此铺垫，《人民日报》在7月28日、29日、30日连续发表的社论中，均有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语句。有几处，句前按陈伯达的意见冠以“武汉地区”字样。

然而，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延伸此语说：“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斗倒斗臭。”并说：“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就有拔剑出鞘的味道了。

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毛泽东突然一个大转弯，改变原先的考虑，针对《红旗》第12期社论批了“还我长城”4个字，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根据毛泽东指示，8月26日，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戚本禹则在1968年1月遭遇同样的命运。

唐平铸的上级主管领导又倒台了，江青和康生对唐平铸的不满越来越溢于言表。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放言“唐平铸是日本文化特务”，让他说清楚《人民日报》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提法的来龙去脉。根据后来整理出的材料，从7月23日至8月28日，《人民日报》共刊登有关七二〇事件的消息34篇、评论22篇、各类文章11篇。但毛泽东和江青对同期新华社电讯稿和军报中的同样表述未见提及。

实际上，《人民日报》的这个表述，唐平铸没有发明权，均为奉命执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不可能对此提出质疑。退一步说，即便他有不同意见，也不能抵制。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唐平铸十分困惑，预感到危险临近，对孩子说：“我在浪尖上起伏，随时有翻下去的可能。”他给自己的老领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回到军队工作，但此时萧华已自身难保。

1968年9月17日，唐平铸突然被送入北京卫戍区某地关押，主要罪状是“恶毒攻击诬蔑康生，反对江青、陈伯达”，并被要求交代《人民日报》社论中与“揪军内一小撮”有关的问题。

直到40多年后，唐平铸的家人仍不知道是谁下达了拘押命令，更没有看到任何与此次拘押有关的文字材料。

#### ◇ 专案审查使“军内一小撮”问题升级

唐平铸历经战火考验，信仰坚定，充满信心，认为自己如果有错误，主要是在执行中出现的，检查一番会被恢复工作。他认真思考，觉得要说清楚“军内一小撮”问题并不是难事，没想到怎么写也过不了关。

唐平铸被关押后，全家都受株连。妻子陈友孟是1937年进入延安抗大的老干部，四处写信给首长和战友寻求帮助。但这次没有任何回音，一拖就是3年。

问题的要害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份报送“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关于《改进解放军报宣传的六条建议》的请示原件，其中第一条写道：“对军队高级领导机关、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指导。”接下来有一句话是：“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报告上送人关锋、王力、唐平铸、胡痴的名字是打印的，但报告首页上只有胡痴的字迹，写着：“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1967

年1月10日。”

林彪在自己的姓氏上画圈，拉出一横线，批了“完全同意”。

这份文件没有下发，文件上的批示说明林彪、江青支持和同意这个说法。唐平铸没有见过这份文件的打印件，更不知道此件的呈送和批示的细节，因此就没有在此前检查中提及。不管怎么说，这份材料出现后唐平铸的问题升级，从中央第二专案组转入第一专案组审查。

实际情况是，《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根据关锋口述，记录和整理了这份请示报告后，要唐平铸过来看一看，把把关，因为他是军报老领导。唐平铸在人民日报社忙得不可开交，认为这是军报的事情，难以抽出时间。经不住老战友胡痴的要求，他就赶去匆匆看了一下这份报告。唐平铸说，像这样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关锋已经口授成文，我没有也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他没有签字，接着赶回了人民日报社。

胡痴按照关锋的要求，列上关、王、唐、胡的名字，打印上报。江青是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自然也有她一份。江青审阅了这份报告，认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还要求报送林彪，说明她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江青摇身一变，将反对林彪、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炫耀的资本。这样一来，从林彪处查出的这份报告原件就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江青把持的专案组即采取措施：一是严密封锁了这份带有批示的原件；二是逼迫经手人胡痴写出“江青不知情”的假供；三是将列名当事人转入第一专案组由江青直接控制，将他们长期关押。

对此事的由来，1977年11月3日，胡痴写信给中央予以说明。原来，1967年1月10日下午，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关锋让胡痴把这份文件的打印件分送中央文革、军队文革负责人和军队一些负责人。江青看后说，这是有关军队的事，赶快送林副主席审批。关锋遂让胡痴注明江青的话，报送林彪。11日中午，林办一秘书电话通知胡痴说，林彪已批示“完全同意”，原件不退了。

1968年春，胡痴被专案组审查，被要求说清“揪军内一小撮”提法一事，但被明确要求，不能提及林彪和江青。胡痴要写，就被扣上“不老实”的帽子。1973年春，胡痴被转入第一专案组审查，审查者硬说江青根本不知此事，还说胡痴批注的字“是给江青同志栽赃、抹黑”；又要胡痴“顾全大局”，由此百般威胁，直到按他们所说写了一个假材料才罢休。

胡痴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之所以经手材料的起草、分发和加注江青的话，因为我是军报的负责人。材料是关于《解放军报》的事，而且是在关锋主持和指示下执行的，我完全是在公开场合按照组织手续办事的，既无个人创造，也没有背后搞鬼。我的错误是执行的问题。”

专案审查中，被关押在另一处的唐平铸的检查怎么也对不上口径。他在被关押中耗费年华，终于心有所悟，赋诗一首：“吹毛求疵何何在，捕风捉影影无踪。以假乱真真可鄙，颠倒黑白白日梦。”

唐平铸的妻子陈友孟和孩子们在痛苦中生活。终于有人指点，求助周恩来还有一线希望。陈友孟毅然写信向周恩来求助，并按照友人指点，要孩子将信送进了中南海指定地点。

这封信奏效了，家属被允许探望唐平铸。陈友孟患病，由孩子背着去看望丈夫。1975年5月，唐平铸被解除了关押，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他的“专案”并没有结束，一直持续到

“文革”结束。

◇ 抗争和思索交织起思想的升华

1978年12月15日，唐平铸收到专案组第四次“结论稿”，再次拒绝签字。他还拍案而起，秉笔直书，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诉。

唐平铸写道：“我在被关押期间，专案人员说：‘你的问题严重，你的案子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位首长亲自抓的。’对我采取了先定调子后找材料的手法……党内一发生问题，对我的审查就来个180°大转弯。陈伯达在台上，就让我交代‘对抗’他的罪行，说我‘恶毒攻击’他。他一垮台，我就变成‘陈伯达利用的人’。林彪垮台前，说我反对他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他一自我爆炸，我就变成‘追随林彪’了。”同样，在江青、康生落败前后，唐平铸的问题性质也随之改变。他质问：“这哪里有什么真理，有什么是非，有什么党的原则？！”

就在此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唐平铸蒙受12年的冤屈终于得到洗刷。198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结论：“给唐平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原中央专案组结论，认定唐平铸遭受诬陷，“属于冤案，应予推倒”。

手持这一纸结论，唐平铸来到久卧病榻的妻子面前。陈友孟的泪水夺眶而出。

唐平铸老了，疾病扑来，他不得不住进病房。但是病房中的安静会使他联想到当年关押中的可怕孤寂，他希望亲人留在身边。

唐平铸在病床上细读《彭德怀自述》，热泪纵横。联想到自己，思绪万千。他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对孩子们说：“我临终留下几个问题，请你们思考。如果领导、上级犯错误，下级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宣传工作，究竟应该怎么搞？人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实事求是，如何能真正做到？”

唐平铸对生命无比依恋。辞世前3天，他叫来儿子记录口述：“在可能离开这美好世界的时候，我以无限深情怀念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怀念我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和亲人们，以及我熟悉的同志和朋友们。”

唐平铸最后说，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和由此产生的疾病的折磨，使我失去了最后冲刺（工作）的机会，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情”。

1985年7月20日，唐平铸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遗言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用作医学病理研究。

□ 原载《党史博览》2014年10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